

斯密学说传入日本和中国的简略评介

严 清 华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重要代表亚当·斯密的学说越过欧洲大陆境域,先后传入地处东亚的日本和中国。

十九世纪末叶的日本,经过“明治维新”之后,已作为资本主义行列中的后起之秀而迈入了迅速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途程。但其发展却受到国内封建残存势力和外国政治经济势力的束缚,并在很大程度上适应了政府对外军事侵略的需要,带有明显的落后和畸形的特征。而且从世界形势看,这时欧美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已开始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因此,日本在这一时期根本不具备产生自己独立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经济基础和历史条件。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也已产生,但却先天软弱,后天不足,受到清王朝封建统治和外国资本侵略势力的双重压迫,发展极其艰难和缓慢。而且也面临着世界资本主义向其最高阶段发展的客观形势。因而也缺乏产生自己独立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经济基础和历史条件。但是,十九世纪末的日本和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同样都存在着发展本国资本主义经济的迫切要求,都需要在经济理论方面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吸取滋养以利于培植本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育成长。斯密学说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先后传入日本和中国的。

据日本学者考证,斯密学说传入日本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1863年至1869年之间。据说日本现在收藏有一本古旧的荷兰经济学者的著作《欧洲经济学史》,书中介绍到斯密及其学说。这本书上盖有日本开成所(1863—1869)的藏书印,被认为是间接地将斯密学说介绍到日本的最早文献^①。西欧经济学一般知识传入日本的时间,据说比这还要早,可追溯到斯密《国富论》刊行的1776年。据说这一年有位植物学家访问日本,最先把西欧经济学传入日本。

日本在正式翻译《国富论》之前,已有学者开始介绍斯密其人及其某些经济学理论。如1870年小幡笃次郎译述的《生产向导》一书中便介绍了斯密的分工理论。1875年和1876年,日本颇有影响的近代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几次撰文评介到斯密及其学说,使斯密的名字在日本迅速流传开来。

日本学者开始翻译《国富论》的时间是1882年。这时,西洋经济学著作已大量传入日本。据这一年刊行的《诸官厅所藏洋书目录》载,这时日本各地收藏的英、法、德等国的经济方面的书籍已达1,800多部,2,100多册。其中除农商务省所藏的技术性、实用性方面的书较多外,其他不少地方所藏之书,经济理论性的占居大半。斯密《国富论》的英文各版书这时也被多处收藏,有的地方如东京大学和东京图书馆还收藏有几部或好几部。可以说,这时的日本已出现了输入西洋经济学说的热潮。

日本最初翻译的《国富论》是以“讲义录”的形式刊行问世的。1878年,日本近代启蒙思想家田口卯吉创立以研究和普及经济学说为宗旨的经济杂志社,定期召集学会会员举行“经济谈会”(不久更名为“东京经济学讲习会”),并出版《东京经济杂志》和讲义录。1882年4月《东

京经济学讲习会讲义录》第一卷刊载《国富论》日译的开头部分,以后各卷陆续登载,但载至《国富论》第一篇第七章止讲义录停刊。到1884年时又重新以分册形式刊行《国富论》单行本第一卷,翌年刊行第二卷,隔二年再刊行第三卷。至此,《国富论》经过六年时间,被完整地译成日文出版了。

完成这次翻译任务的主要是日本近代初期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理论比较活跃的人物之一石川暎作。他于1882年加入田口卯吉创办的经济杂志社,并成为经济学会的干事而开始翻译《国富论》。不幸于1886年他因病而以28岁的暂短生命与世长辞,《国富论》的翻译还剩最后一篇即第五篇尚未完成,后由其友人、经济杂志社成员嵯峨正作接着翻译,方得以遂其未竟之志。石川暎作翻译《国富论》具有非常明确的目的,他在译完前四篇后于“译者志”中说道:此四篇“均在驳斥和论证商制(指重商主义政策——引者)之谬妄,阐明增加社会财富之要道不在干涉保护而在自由交易之理。此实乃全书之要领。……通读全书,足以明保护政策之非,知自由交易之有益于社会矣。”他的目的就是要借助斯密的权威,批判保护论者的“谬妄”,为日本资本主义的自由发展鸣锣开道。

日本将《国富论》全部翻译刊行的时间是明治21年即公元1888年,比中国严复将之全部译出版的时间早14年。

英文版《国富论》开始传入中国的具体时间尚未查清,严复着手翻译此书的时间是戊戌变法的前一年即公元1897年。他将此书的中译名定为《原富》,1901年译出前两篇交上海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译书院出版,1902年10月译完全书并出版发行。

《原富》在中国刊行之前,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也已开始传入中国。据现有文献记载,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后期,美国传教士丁韪良首先开始在清朝政府为培养翻译人材而设立的北京同文馆讲授“富国策”(即经济学),最早把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传到中国来。之后,陆续出现了几部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中译本和介绍西方经济制度、经济政策的译本。因而《原富》的刊行,在当时的中国来说,也并不是孤立的和偶然的。

严复翻译《原富》也有非常明确的目的。他认为这本书“察究财利之性情,贫富之因果,著国财所由出”,阐明了谋求国家富强的基本指导原理。同时,“其中所指斥当轴之迷谬,多吾国言财政者之所同然,所谓从其后而鞭之”^②。在他看来,斯密对重商主义理论的批判,对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的抨击,也击中了中国的时弊,可以借来作为批判的武器。他深刻地领会到《原富》的主旨在于宣扬经济自由主义,他极为欣赏斯密的自由贸易主张,宣称这是他“独有取于是书”^③的地方。可见他的主要目的也在于借助斯密的理论,批判保护论者的“迷谬”,宣传经济自由主义的原则以为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服务。

严复翻译《原富》是相当认真严谨的。他说他在翻译时“虽于全节文理不能不融会贯通为之,然于辞义之间,无所颠倒附益。”^④不仅翻译《原富》如此,他一生翻译过多种著作,其态度都相当审慎。他宣称自己的译文“字字由戡子称出”^⑤,是极为精确的。严复曾留学英国多年,掌握了比较丰富的政治经济学知识,其英语和汉语水平也相当高,因而其翻译水平在当时的中国是第一流的。相比起来,石川暎作未曾出国留学,只在国内学过几年英语,其《国富论》的翻译水平虽在日本来说是比较高的,但却不一定就在严复的《原富》之上。而且,严复在翻译《原富》过程中,还另撰有三千多字的“译事例言”和六万多字的按语。在这些文字中,他除补充一些斯密以外其他经济学家的理论外,还多处抒发己见,涉及、讨论了许多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就是说,他对《原富》不是单纯的翻译,而是译中有论,有译有论。石川暎作虽也不是简单的翻译《国富论》,他在译文中也加了许多文字,但他只是为了便于日本读

者理解原文,加了一些纯粹属于解释文意的译注。在这方面,石川暎作就显得不如严复了。

然而,石川暎作所译《国富论》在日本发生的影响却超过了严复所译《原富》在中国的影响。石川暎作翻译的《国富论》刊行后,却在日本思想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当时,日本思想界存在着自由贸易论与保护贸易论之间的激烈争论。《国富论》翻译刊行后,争论双方都对之予以极大的关注。自由贸易论者对之大加赞赏,极力宣传,当作一面理想的旗帜来挥舞;保护贸易论者则对之予以否定,极力诋毁,当作一个历史的靶子来批判。一时间,斯密及其学说竟然成了日本学术界争论的一大中心议题。不仅如此,斯密学说后来还一直成为日本学术界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据我们接触到的有限资料来看,截至1976年,日本出版的不同译者或不同版本的《国富论》日文译本就有十四种之多。关于注释、解说、研究《国富论》和介绍、研究斯密及其学说的专著、论文集,以及包含有介绍、研究《国富论》和斯密及其学说的书籍,更是汗牛充栋。1923年日本许多大学、学会隆重热烈地开展了纪念斯密诞生200周年的学术活动。1950年还成立了由热衷于斯密研究的学者们所组成的学术研究团体“亚当·斯密会”。可见,《国富论》在日本学术界所引起的反响和发生的影响,是相当之大的。

严复翻译的《原富》刊行后,对当时的中国思想界也曾发生过一定的影响。这本书第一次把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介绍到中国来,最先引起了人们对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原理的重视。加以当时在思想界负有盛名的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撰文介绍此书的刊行,这对于扩大此书的影响是相当有利的。但是,正如梁启超所说,严复的译文“太务渊雅,刻意摹仿先秦文体,非多读古人之书,一翻殆难索解。”^⑥本来,斯密的原作理论性较强,已够渊博精深的了,再加上严复的译文渊雅古奥,一般读者对政治经济学又十分陌生,哪里能够看懂!所以《原富》对当时中国思想界的影响还是相当有限的。加以当时中国正遭受着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斯密的自由贸易主张不适于保护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这种情况也在客观上限制了《原富》对当时中国的影响的发生。后来,《原富》一书并未被继续流传,直到1931年,郭大力、王亚南同志“作为翻译《资本论》的准备,为宣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准备”^⑦,才将之重新译成中文并改名为《国富论》出版。正如王亚南同志所说:“这个以《原富》为名的译本,在1902年出版以后却不曾引起任何值得重视的反响。”^⑧

石川暎作翻译《国富论》的时候,日本的“明治维新”已取得成功;严复翻译出《原富》的时候,中国的“戊戌变法”却遭到了失败。在日本,资产阶级改革派当权;在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却被杀或逃亡。“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⑨中国和日本所处的历史背景既然存在着如此之大的差别,斯密学说传入两国后在一段时期内所引起的反响和发生的影响当然就不可能完全一样了。

注释:

① 本文有关日本问题的资料主要来源于下列日文书:杉原四郎著:《日本经济思想史论集》,未来社,1980年版;大河内一男著:《亚当·斯密》,讲谈社,1979年版,大河内一男编:《〈国富论〉研究》,筑摩书房,1972年版;高岛善哉著:《斯密〈国富论〉解说》,春秋社,1953年版。

②④ 严复译《原富》“译事例言”。

③ 《原富》按语。

⑤ 严复译《法意》按语。

⑥ 《新民丛报》第1期。

⑦⑧ 郭大力、王亚南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改订译本序言”。

⑨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0页。